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 施 旭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5

DANGDAI ZHONGGUO HUAYU YANJIU

◎ 施 旭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第5辑 / 施旭主编.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04-037303-5

I. ①当… II. ①施… III. ①汉语 - 话语语言学 - 研
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9656号

策划编辑	贾巍 谢森	责任编辑	王代军	封面设计	顾斌	版式设计	魏亮
责任校对	王代军	责任印制	张福涛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奥鑫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8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7303-00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编委会

主 编： 施 旭 浙江大学

编 委：

曹顺庆	四川大学
陈汝东	北京大学
陈新仁	南京大学
池昌海	浙江大学
丁建新	中山大学
窦卫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冯捷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顾曰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 敏	华东师范大学
李 岩	浙江大学
李战子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梁晓波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冉永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谭学纯	福州师范大学
田海龙	天津商业大学
王 宁	清华大学
吴东英	香港理工大学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
尹韵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
余盛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袁 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直心	杭州师范大学

执行编辑： 陈 珏 浙江大学
书评编辑： 汪学磊 杭州师范大学

目 录

■ 公共人物话语解读的语用身份视角——从“我反正信了”说起	陈新仁	1
■ 全球视域下中国城管身份的话语建构	唐青叶	10
■ 河洛文化话语向度研究——以洛阳河洛文化旅游节相关新闻为语料	贾焕杰	22
■ 媒体话语中的宁镇扬“同城化”——宁镇扬“同城化”形象的媒体传播现状与启示	吴 鹏	33
■ 当代话语研究语境下的艺术话语问题	时胜勋	44
■ 话语与中国社会变迁——以不同历史时期女性服装广告语对比为例	赖会娣	59
■ 门诊医患会话患者应答语信息过量的语用研究	武宜金 马 文 王晓燕	70
■ 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会徽为基点	孙 毅	82
■ 新疆少数民族预科学生汉语运用能力现状调查	晁正蓉	90
■ 女性主义研究的文化话语转向：试论女性主义话语研究的动因、原则与策略	杨 娜	98
■ 华裔美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角逐	梁 颖	109

公共人物话语解读的语用身份视角^①

——从“我反正信了”说起

陈新仁

摘要：语言交际者在进入具体交际事件前拥有各种社会身份，进入交际后无论愿意与否都一定会从若干社会身份中做出有意或无意的选择（由此产生语用身份），甚至构建并不实际存在的身份。不同的语用身份具有的语用价值，对交际方式、过程、得体性、合适性、结果等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语用身份选择不当，会产生严重程度不等的后果。本文以一位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话语为例，从语用身份视角剖析该公共人物的身份选择，解读该话语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背后的语用失调，从而为开展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公共人物；语用身份；语用失调；批评语用分析

1 引子

“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26小时之后，官方新闻发布会终于在温州举行。当铁道部前发言人王某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之后，当被问到为何要掩埋车头时，王某这样回答：“关于掩埋，后来他们（接机的同志）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王某用力一甩脑袋，这段画面也被制作成GIF动画，在微博上发布。

动车追尾事故造成重大伤亡，新闻发布会又未能给公众提供很有说服力的回应，尤其是“奇迹说”、“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无奈说”，引发了公众极大的不满，催生了所谓的“高铁体”。网友开始用“×××是奇迹，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作为高铁体进行造句。腾讯微博上出现一位叫“高铁体”的网友，发动了一个叫“高铁体造句大赛”的活动，以表达对事故的质疑。该网友称：“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为句式进行造句，优胜者将获得10万Q币和铁道部发言人职位，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很快，“高铁体造句大赛”有7000多网友参与，大多数的造句都带有质疑和讽刺的色彩。例如：

- (1) ——人民卫士：中国足协说：中国足球能进2014世界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① 本文为南京大学“985工程”三期改革型项目“当代西方语言学前沿理论研究与探索”（NJU985JD05）及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成果。

——我不相信：北京今天没堵车，这是一个奇迹，但它就是发生了。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作为汉语中的一个常见表达方式也许很多人都使用过，为什么偏偏王某使用了它就引发如此关注呢？除了相关事件引人关注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对此，笔者拟以王某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这段话语为例，从语用身份视角剖析该公共人物的身份选择，解读该话语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背后的语用失调，从而为开展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2 公共人物及其话语

公共人物，亦称公众人物，是指一定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如知名人士、文体明星等。一般说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性是公共人物的构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相应地，公共人物话语指公共人物在任何场合下发出的话语（广义）或公共人物在公共场合或公共媒体上发出的话语（狭义）。严格地讲，分析公共人物的话语，应该采用狭义的解读，这与我们后面要讲的语用身份界定是一致的。公共人物的身份通过其话语（狭义）呈现、表征；反过来，公共人物的话语（狭义）可以构建、揭示其公共人物的身份。

出现在记者招待会的新闻发言人属于典型的公共人物，除非特别说明，他的一言一行均代表相关部门或单位。对于新闻发言人而言，他们作为发话人(utterer)发出的话语一般情况下都传达了相关部门或单位的声音(voice)。试看下例：

(2) 记者：为什么网上有人说铁道部公布死亡数字是四十几人，而现在怎么说是35人？死亡人数究竟是40多人还是35人？

王某：根据我掌握的数据，死亡人数就是35人，至于有人说我在网上发布过死了四十几个人的数据，我要澄清一下，我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采访，我也没有在网上提供这样的数据。我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再次说明，至今是35人死亡，192人受伤。

记者：发生此次特大事故，是不是会让老百姓失去对高铁的信心，你怎么看待此次事故的影响？

王某：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是合格的，我们仍然很有信心。

记者：为什么在宣布没有生命迹象之后，竟然又发现幸存的小女孩？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拆解车厢过程中还会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王某：我只能说，事实就是这样，它确实发生了，类似事件应该不会发生。

在上面的对话中，无论是王某自己使用的“我”、“我们”，还是记者所使用的“你”，都不指代王某本人，而是指称他作为铁道部发言人的身份。当他使用“以铁道部发言人的身份”加以申明时更是明确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

3 语用身份及相关假设

身份问题历来是文化研究、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尤其是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的关注话题(Erikson, 1950; Erikson, 1968; Spencer-Oatey, 2007)。从社会学角度看, 身份涉及“我是谁?”, 指的是个人的自我(selfhood)的核心因素, 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性的”东西(如年龄、性别、职业、社会阶层等), 具有稳定性(Tajfel and Turner, 1986; Simon, 2004)。Brewer 和 Gardner (1996, p.84) 基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界关于身份的研究, 认为身份存在三个层次的表征: 个体表征(the individual level)、人际表征(the interpersonal level)和群体表征(the group level)。个体表征指的是特定个体区别于其他个体的独特自我概念; 人际表征指的是关系型自我概念, 源于与其他社会个体发生联系的交往关系、角色关系而形成的自我概念; 群体表征指的是源自个体或隶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自我概念。相应地, 身份在不同层次上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类型: 个体身份(individual identity)、人际身份(interpersonal identity)和群体身份(group identity)。显然, 上述身份从本质上讲都是社会性的, 没有真正进入交际层面, 与具体的交际语境、交际意图无关。

随着话语分析、语用学、会话分析等的崛起, 人们开始关注语言使用(如谈话)与身份之间的关系(Antaki and Widdicombe, 1998; de Fina, 2003; de Fina, Schiffrin, and Bamberg, 2006; Ho, 2010; Holmes, 2005; 袁周敏, 2009, 2011), 一个基本的观点是: “谈话就是在做身份工作”(Tracy, 2002, p.7)。Tracy (2002) 认为, 在做面子工作的过程中, 交际者让参与者甚至旁观者了解到是谁在谈话。一方面, 说话人的话语方式会构建其身份; 另一方面, 说话人已经存在的身份(如年龄、性别、职业、社会阶层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谈话方式。Tracy (2002, pp.17-20) 同样对身份进行了分类, 而她的分类与交际的联系就更加明显了。她区分的四种身份类别是: 1) 主要身份(master identity), 指社会个体特质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如性别、种族、年龄、国籍等。2) 交互身份(interactional identity), 指社会个体在具体语境中与他人交往时所呈现的角色。这种身份具有情景性和交互关系依赖性。一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呈现不同身份——或是领导, 或是下属; 或是父亲, 或是儿子; 或是朋友, 或是敌人。3) 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 往往与一个人的人格、态度、性情、谈话方式、交往方式(如诚实、理智、公正、阿谀奉承等)等相关。4) 关系身份(relational identity), 指在确定的情景中人们与其会话对象交谈时所展现的关系。关系身份涉及交际双方的交往特性, 比如交际双方是否平等以及社会距离是远还是近。其中, 交际身份与关系身份与交际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 话语分析者需要完全从交际角度对身份进行定义。Tracy对于身份的分类兼顾社会性和交际性标准, 容易产生混淆。为此, 笔者提出“语用身份”(identity in use或pragmatic identity)的概念, 以区别于“社会身份”, 影响交际的不是抽象的社会身份, 而是特定社会身份的语境化。所谓语用身份, 是指某个(些)社会身份(个体身份/人际身份/群体身份)在语言交际语境中的实际体现、运用甚至虚构, 即说话人或作者发出特定话语所选择的特定(一个或多个)身份, 听话人或读者在理解特定话语所选择的特定身份, 甚至是说话人或作者发出特定话语中所提及的特定(一个或多个)身份。例如:

- (3) a. 你放心，我会帮助你的。
 b. 你放心，我们是朋友，我会帮助你的。
 c. 你放心，我们是长期合作的伙伴，我会帮助你的。
 (3) 南京一国土局副局长酒后开车撞死女中学生

在(3a)中，说话人没有明确提及的身份，听话人可以理解说话人可以以任何身份讲这句话；在(3b)和(3c)中，说话人则明确地从各种可能身份中选择一种身份（分别为朋友身份和合作伙伴身份）作为其语用身份，这一身份成为听话人理解其话语的基础。在(3)中，新闻记者明确提供了车祸肇事者的身份以及受害者的身份，二者截然不对称的身份为读者理解其背后的深层含意提供了帮助。

由于交际情境的制约，交际中的语用身份可以区分为默认身份与非默认身份，前者一般用于常规情境，无需语言标记，发挥一般或常规交际功能，具有稳定性；后者则用于非常规情境，往往带有语言标记，发挥某种特别功能，具有临时性。例如，对于一名教师而言，该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上课时的默认身份是教师，在办公室与其他教师交流时的默认身份是同事；如果该老师在课堂里摆出与学生做朋友的身份，则是非默认身份，或曰变异身份，往往使用与教师身份不一致的话语方并突出自己以朋友身份相处的标记（如“作为你们的朋友”），而这样做一般都有某种特别的目的（如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Tracy (2002)提出“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的概念，以区别于一般的“谈话”（talk）。前者将谈话行为看作一种包括不同部分和行为类别的活动，而后者会让人认为谈话行为是一种单一的事物。话语实践可以指一小段谈话（如自我指称或称呼他人），也可以指大篇幅的谈话（如叙述）；可以指单一的、可以命名或指认的特征（如言语行为），也可以指一系列特征（如方言、立场）；可以指某个个体的话语行为特征（如直接话语风格）或多方参与完成的行为（如交互结构）。在Tracy看来，话语实践与身份之间存在交互关系：一个人用来交谈的身份会影响该说话人的交际方式；同时，一个人选择的话语实践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或她被看作谁以及交际对象被看作谁，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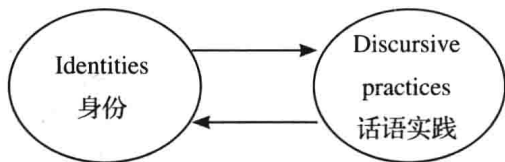


图1 话语实践与身份的交互关系（Tracy, 2002, p. 23）

我们知道，（社会）身份往往与一定的行为规范、权利与义务、一定的行为影响或行为效果联系在一起，也往往与一定的语言形式联系在一起。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语境中，（社会）身份的上述内在属性会转化为影响语言选择的重要因素，交际者会考虑到特定身份属性对于交际过程或结果的影响（即我们拟称为交际价值的属性）而选择（建构）特定的（语用）身份说话，并体现为一系列的在话语各个层面上发生的语言选择和

话语内容选择。

基于对社会身份的认识以及话语实践与身份的交互关系,我们拟提出有关身份与交际的下列基本假设:

1) 语言交际者尽管在进入交际前拥有多重社会身份,但进入交际后发出特定话语时却往往只会是基于一种身份,即体现为语用身份。语用身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无论说话人愿意与否。

2) 语用身份选择可以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有意的或积极的语用身份选择是一种顺应过程;为了满足特定交际需求,交际者会顺应当前语境因素选择甚至虚构某一身份进行交际。

3) 由于身份关系的交互性,说话人选择了自身语用身份的同时,也就为听话人的语用身份做出了选择。听话人可以认同说话人为自己确定的身份,也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语用身份;必要时,交际双方会对身份选择进行磋商;说话人与听话人语用身份选择或构建的错位会带来误会。

4) 语用身份是交际者为满足交际需要可供调配的语用资源之一。不同的语用身份具有的语用价值,对交际方式、过程、得体性、合适性、结果等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5) 说话人语用身份选择或构建不当,会产生严重程度不等的后果。

我们不妨用下例来说明上述假设:

(4) 康熙御驾亲征,不幸染上重疾。留守的太子在宰相的怂恿下企图提前登基,后被康复了的康熙获悉(陈新仁,2004:45)。

太子:皇阿玛,我错了。

康熙:不要叫我皇阿玛,叫我皇上。

太子:皇上,儿臣错了,请皇上降罪。

该例中,当太子称呼康熙时,像往常一样使用了“皇阿玛”,可以说是一种无意的、默认的选择。即使是这种无意的过程也体现了一种选择:从社会身份而言,他既是臣子,又是儿子(当然还有其他身份)。当太子使用“皇阿玛”,就从二者中做出了选择。康熙不满意儿子对他的身份设定(“皇阿玛”意味着他与儿子此时的语用身份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而是要求将太子称他为“皇上”,从而将太子设定的父子关系变更为君臣关系。身份的变更背后是变化了的角色关系,康熙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公正地甚至是冷酷无情地实现其惩治犯乱太子的目的。这里君臣关系的选择体现了语用身份的协商性。然而,交际双方不仅可以通过协商选择合适的语用身份,而且还可以使用相关的语言资源对语用身份加以建构,如太子改用“儿臣”和“皇上”重新定位自己与康熙的关系,就体现了语用身份的语言建构性。

下面,我们基于上述假设,分析前面提及的新闻发布会上王某使用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句话,揭示该话语使用背后语用身份选择的失当,从而从一个侧面解释该发言人未能取得预期发言效果甚至引发巨大消极效应的内在因由。

4 语用身份论视角下对“信不信由你”的解读

作为一个社会个体，（铁道部）发言人王某在进入新闻发布会前有多种社会身份：基于Brewer和Gardner（1996）的区分，他具有个体身份、人际身份和群体身份。从个体身份看，他是一个男性、中年人、汉族人、中国人等等；从人际身份看，他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一些人的朋友、一些人的部下、一些人的领导等；从群体身份看，他属于（政府部门）发言人这样的一个群体。基于Tracy（2002）的区分，王某的主要身份同样是男性、中年人、汉族人、中国人等；交互身份是一个发言人，与在场记者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个人身份应该是诚实的、理智的、公正的、客观的形象；关系身份应该是友好的、热情的。从语用身份来看，我们认为，王某在新闻发布会这样的交际语境下发出的任何话语都应该采用铁道部发言人这样的身份，除非特别说明。换言之，发言人是其当前语境下的默认语用身份。

事实上，王某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也是如此定位自己的语用身份的。前面，我们在例（2）中就发现，王某曾用“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突显自己的发言人身份。既然如此，王某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发言人无疑属于公共人物的范畴。从职业上看，（政府部门）发言人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下列情况：

- 1）（在合适的场合，如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代表特定部门或单位（的利益、观点、立场等），而不是本人；
- 2）发言人在允许的范围内有义务向记者或公众提供其希望了解的信息；
- 3）发言人在可能、允许的情况下，应遵循合作原则，特别是恪守质的准则，提供的信息应该真实、客观、权威、可信；
- 4）发言人有权（使用“无可奉告”之类的话）拒绝回答任何涉及机密或敏感内容的问题，也可加以巧妙回避；
- 5）发言人可以使用“我”、“我们”或相关部门或单位的名称自指（除非特别说明，如“这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通观王某在“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的话语表现，我们认为，他绝大多数时候所选择的语用身份都是发言人身份，履行了一个新闻发言人应该具有的话语实践。由于掌握的第一手情况有限，他也合理使用了一些话语方式来提示现场听众正确把握他提供的信息，如“关于掩埋，后来他们（接机的同志）做这样的解释”，“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根据我掌握的数据”，“我要澄清一下，我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采访，我也没有在网上提供这样的数据”，等等。问题是，他在答记者过程中并没有始终坚持这一语用身份，一些话语实践更像是基于一个社会个体的身份，如“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问题是，为什么凭这样的话语就可以认定王某在发出该话语时（无意中）不恰当地选择了个人身份呢？首先，王某在使用这句话时是与一个在场记者进行单独交流，而非面向所有在场的听众。其次，这样的话语一般出现在个人之间的言语交往中，而不应出现在新闻发布会这样的公共场合。由于王某的当前语用身份应该默认是新闻发言人，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代表政府部门的发言人具有权威性，其发布的信息或评论具有不容置疑性，他应该对其话语传递的信息的真实性负责，而不是由交际对象来决定是否真实。“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是对质准则的挑战：发言人不应该在其话语的真实

性问题上退步，否则会否定其发言人身份。这一说法动摇了发言人身份，使其所有话语的可信度、权威性、诚意等大打折扣，很自然，这样的话语方式引发了怀疑、不满甚至愤怒（如前面提及的高铁体）。

不仅如此，该话语中的“反正”一般也只出现在个人话语中。根据《现代汉语辞海》（p.270）对“反正”的解释，该词作副词用时有两个意思：1）表示情况虽然不同而结果并无区别，如：反正去不去都是一样。/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他不答应。2）表示坚决肯定的语气，如：你别着急，反正不会误事。

正是因为王某无意中泄漏了自己无法保证自身话语真实性这一信息，加之他又有点盲目地使用了“反正”这一坚决肯定的语气（而且肯定的内容又不是能够让他确信的事实），这才火上浇油，使得原本因为事故造成重大伤亡而悲伤不已的在场以及不在场的广大社会公众更加愤怒起来。人们不会去相信一个没有客观根据却说话武断的发言人，会对其发言人身份的合适性产生怀疑，对其本应有的权威性发起挑战。

难怪“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言后之果不限于所引发的现场听众的反应。事发不久，王某被调离铁道部发言人岗位，远离家乡赴波兰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尽管相关部门辩解王某并没有“做错事”，声明这是一次正常的“同级调任”而非“免职”，但不少明眼的网友还是认为王某的调任其实是“祸从口出”，“奇迹终于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了”。这种“祸”，在笔者看来，源自其发出上述话语时情急之下的语用身份失调，而在群体身份重于个人身份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身份失调往往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或人际后果。毕竟王某代表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代表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铁道部，他个人的言语过失自然被公众强行解释为一种集体的过失，而这是不能被相关部门接受的，“剥夺”他的发言人身份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

5 结语

本文从一次引发广泛社会争议及影响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使用的一句话（“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谈起，探讨了社会身份如何语境化成为语用身份，进而影响话语的解读。

笔者认为，语言交际者在进入交际前拥有的各种社会身份并不是影响其言语产出及解读的根本因素，影响交际进程的因素其实是说话人从若干社会身份中做出的某种选择（由此产生语用身份）。在相同的语境下，选择不同的语用身份会产生不同的语用价值，对交际方式、过程、得体性、合适性、结果等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交际中的身份不是事先设定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动态的语境中选择产生的，并可能随着交际的进行而发生变化。说话人对于语用身份的选择会反映在其语言选择上；反之，说话人的语言选择会有助于建构其特定的语用身份。

本研究的案例分析显示，语用身份选择不当，特别是对于群体身份重于个人身份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公共人物来说，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仅使公众对该公众人物发出特定话语的动机发生理解错位，而且可能会导致该公众人物成为自己言语不当的直接受害者。

参考文献

- [1] Antaki, C. and Widdicombe, S. (eds.) *Identities in Talk* [M]. London: Sage. 1998.
- [2] Brewer, M. and Gardner, W. Who is this 'we'? Level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 represent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1): 83-93. 1996.
- [3] De Fina, A. *Identity in Narrative: A Study of Immigrant Discours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 [4] De Fina, A., Schiffrin, D. and Bamberg, M. (eds.) *Discourse and Ident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 Erikson, E. *Childhood and Society* [M]. New York: Norton. 1950.
- [6] Erikson, E.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M]. New York: Norton. 1968.
- [7] Ho, V.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through request e-mail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2253-2261. 2010.
- [8] Holmes, J. Story-telling at work: A complex discursive resource for integrating personal,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identities [J]. *Discourse Studies* 7(6): 671-700. 2005.
- [9] Simon, B. *Identity in Modern Socie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 Blackwell, Oxford. 2004.
- [10] Spencer-Oatey, H.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the analysis of fa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9: 639-656. 2007.
- [11] Tajfel, H. and J. C. Turner.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A]. In S. Worchel and W.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M]. Chicago: Nelson-Hall. 1986.
- [12] Tracy, K. *Everyday Talk: Building and Reflecting Identities*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2.
- [13] Turner, J. C. Towards a cognitive redefinition of the social group [A]. In H. Tajfel (ed),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4] Turner, J. C.,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 [15] 陈新仁. 语用学研究的社会心理维度 [J]. 中国外语, 2009(4).
- [16] 陈新仁. 论语用平衡 [J]. 外语学刊, 2004(6).
- [17] 刘振铎. 现代汉语辞海 [M]. 延吉: 延边教育出版社, 2001.
- [18] 袁周敏. 克林顿总统就职演说的身份建构研究 [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2009(2).
- [19] 袁周敏. 社会心理学与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1(4).

The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Figures'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Pragmatics: A Case Study of "Anyway, I Believe It"

Participants to verbal communication possess a variety of social identities prior to their entry into specific communicative events. They, willy-nilly, make an identity choice from the range of

identities available to them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consciousness,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notion of identity in use or pragmatic identity. They may even construct an identity that they do not actually possess. As different pragmatic identities have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values, yielding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manner, process, appropriateness, felicity, result, etc. of the communication at hand, any improper or inappropriate construction of pragmatic identity may lead to bad consequences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severity. This study, focusing on an utterance produced by a spokesman at a press conference, sets out to analyze the discourse of public figur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eaker's identity construction, with a view to revealing the related pragmatic failure that has caused a stir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t is hoped that the identity-based discussion presented here could contribute a new perspective to the enterprise of critical pragmatics.

作者简介

陈新仁，男，汉族，江苏东台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语用学、二语语用习得、外语教育、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

全球视域下中国城管身份的话语建构^①

唐青叶

摘要：中国多个城市城管与摊贩的冲突事件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城管”一词成为英语的新外来语，局部地塑造着中国国家形象；在国内，城管形象被“妖魔化”，一种新的城管话语作为社会实践在建构着社会结构、社会事实和城管自身。本文从社会符号学、话语表征角度基于官方手册、国内外媒体、百科网站有关语料分析外国媒体和中国媒体所建构的中国城管身份，揭示全球视域下秩序意识形态导致的城管形象话语表征的差异。

关键词：城管；身份构建；话语；差异化表征；意识形态

1 引言

继“关系(guanxi)”、“红包(hongbao)”之后，“城管(chengguan)”一词成为英美媒体的“新晋词汇”（《新京报》2009年4月26日）。这是因为中国城管与摊贩冲突的负面新闻，如2006年北京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李志强、2008年魏文华拍摄天津市城管暴力执法被殴致死，引起了《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时代》等英美媒体的广泛关注。这些报道局部地构建着中国国家形象，影响着外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在国内，“城管打人”的报道也时见报端。2011年5月18日，中国首份《城管网络形象分析报告》出炉。该报告指出部分城管人员的执法行为失当，其形象“妖魔化”(demonize)。每天，城管与摊贩依然在中国各大城市进行着生存博弈，妖魔化城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公众热议。一种新的城管话语作为社会实践在建构着中国社会结构、社会事实和城管自身，体现了话语的表征、建构和行动功能。本文从社会符号学、话语表征角度基于中国官方的城管执法手册、国内外报刊网络媒体、百度、维基百科等语料探讨媒体对城管身份的话语建构，在全球视域下考察中国城管形象话语表征的英汉差异及其根源。

2 理论框架

2.1 表征与差异

亚里士多德将所有艺术——语言、视觉和音乐都界定为再现，亦称表征(representation)。表征具有符号学特征，就是用语言等符号资源生产意义，象征、代表或指称所谓“现实”世界中的各种人、物及事，再现现实世界。霍尔(2003: 28)认为，用符号(包括语言等各种符号及其代表和表述事物的诸形象)表征绝不是一个简单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弱势群体身份表征的英汉多模态话语对比分析”(编号为10BYY085)的部分成果。

的直接的过程。表征是使世界的意义合乎自己利益的手段，是赋予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以具体的形式（即不同的能指）的过程。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物质化，从而自然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过程，包含着赋予世界及人在其中的位置以意义的权力。所以符号表征与权力有关，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运作方式。表征与权力、意识形态、性别、种族、主流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等重要问题有密切联系。无权者缺乏表征自己的资源和机会，他们往往被主流媒体或权势者所表征。人们在表征事物时，总会受到利益和各种偏好的影响而导致对事实的歪曲，从而产生差异性表征。差异性也就成为表征的主要组织原则。在表征理论中，差异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中介性。差异使客观物质世界能被他物反映，同时也能反映他物（徐连明，2008）。Saussure认为语言符号并不反映事物，其意义也并不取决于事物，而是取决于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的差异关系。只有在差异的系统中，意义的生产才是可能的。在符号学看来，表征被认为是依据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的差异关系进行意义生产的过程。语言符号并不能再现客观世界，只是建构了一个与之相似的话语世界；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来自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相反，是表征系统将意义赋予了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差异是现代社会的逻辑，在人类利益斗争的历史中，差异的制造与消弭呈现为无数有形无形的规则、法令、标准和习俗的制定与废除。

2.2 身份的话语表征实践

表征的意义与表征主体，即表征者以及被表征对象，的身份密切相关。身份是符号的潜势（Blommaert, 2005: 207），差异使身份表征成为可能，而且使身份表征体现为多重性的意义建构过程，也使得被表征者对被赋予的身份可以承认或拒绝。福柯（1969: 172）在《知识考古学》中说，档案确认我们就是差异，我们的理性就是话语差异，我们的历史就是时间差异，我们的自我就是面具差异。制造差异是人的利益争夺的一种主要策略。由于差异，人被分为三六九等。表征作为文化实践，始终伴随着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反控制的权力斗争。权力生产差异、形塑关系。话语的功能是表征、建构和行动（to represent, to construct and to act），身份的话语表征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身份折射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或一群人究竟是谁的问题，是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标志。学术界对身份的研究方法各异。Fina 等人（2006）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身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身份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谷小娟、李艺，2007），国内也出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研究，如身份理论与二语习得（李战子，2005），形象、面子与身份构建的语言形式与策略（李成团，2010）等。身份表征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关注的议题。它涉及交际参与者的角色、权力、地位等特定语境因素对语言形式选择的制约。因此交际中必然存在自我身份和他人身份的再现，以及与身份相匹配的语言形式，反过来，语言选择也能体现各种身份地位等非语言因素（冉永平，2007）。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的语言三个层次观，即体现（realization）、实例化（instantiation）和个体化（individuation）（马丁、王振华，2008）为我们研究身份表征提供了理论视角。在这三种层次关系中，语言系统的低一级层次体现高一级层次，音系、词汇语法和语篇语义各层次之间是体现关系，语篇是从抽象语言系统中所做选择的实例化，同时又是识解主体生成实例语篇时观点、态度的个体

化。个体化指的是某一种文化意库（reservoir）与特定个体意库（repertoire）之间的互动，处于文化意库与个体意库之间的连续系统。在个体化的层级模式中，文化意库处于顶端，个体意库处于底部，二者相互作用。二者之间从上到下依次为系统、编码取向、圈子关系、个体。一个人在文化系统中互动，互动时选择意义的编码取向，选择自己圈子和个体，所以身份表征是个体的意识形态与个体间良性互动的结果，身份研究应该将个体特征、社会现实、权力和意识形态等考虑在内。媒体的报道作为一种“真实”的再现或虚拟真实，往往是在某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进行的。当媒体一味对某些社会群体的负面性进行片面化筛选、加工、聚焦、放大、强化时，就造成了对该群体的“妖魔化”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种刻板印象反映了媒体所处的社会权力结构和主流群体的意识形态，实践着媒体从业者所属团体的范式和价值体系、利益、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3 城管身份的表征

城管这一群体非中国独有，印度、俄罗斯和英美等国都有。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苏美尔城邦时代，就出现了以看守城门、整顿市场等为任务的城市专职管理人员，他们享有一定的处罚权。1667年，法国巴黎设立了警察系统，这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建立的起点。据英国史料记载，1829年9月29日，一群头戴皮帽，脚蹬皮靴，身穿藏青色燕尾服和长裤的“城管”走上伦敦街头。现在，英国仍有类似“城管”的社区警察（《环球时报》2011年06月23日）。中国至少在唐朝就有类似城管之类的职业，称为“监市”（见《旧唐书》，“监市践于衙，理市治序”）。中国各大城市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简称城管局）成立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1997年城管制度试点，2002年大面积铺开，目的是建设和维护各城市的环境秩序、道路交通、城市面貌、城市规划等，是城市管理的一部分。随着城市的扩张，城管不断扩权，而当今“地方政府要秩序，失业游民要生存，社区居民要环境”导致政府、城管、社会公众、摊贩、城市秩序各方面矛盾突出。长期以来，中国城管因自身的原因以及媒体的报道呈现给公众的是负面的暴力执法者形象，完全被妖魔化，国外媒体也十分关注中国这一社会矛盾。本文比较中外媒体秩序意识形态视域下对中国城管这一特定群体的身份表征差异，所用语料来自中国官方机构编写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国内外报刊网络以及维基、百度百科。

我们在探讨城管身份时，主要关注城管这一群体是如何被相关话语系统建构的。城管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而是在当今中外特定的历史时期由特定的话语所建构。我们关注这类话语的内容、形式、过程，关注具体的语言交际事件、活动参与者（话语主体、说者、听者）与权力的关系，着重分析谁在说话，为谁说话，谁不在说话，用什么媒介说话，分别采取了怎样的话语策略，这种差异化表征背后潜藏着怎样的秩序意识形态。

3.1 国内媒体对城管身份的表征

3.1.1 《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强势群体形象

《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以下简称《实务》）是中国语境下城管形象的符号建构。该书作者署名为“课题研发组”，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是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培训中心的培训教材。该书主要介绍了城管